**debt, human/人情(Rén Qíng)**

|  |  |  |
| --- | --- | --- |
| European Perspective | Gerald Cipriani | 27 May 2022 |

在现代西方的文化和语言背景下，对"债务"一词最惯常的理解，往往是指对某人或某些实体的物质--最常见的是经济上的义务；换句话说，即必须偿还的责任，例如在规定时间内偿还借来的一定数额的钱。不过，"出于感激的个人人情债 "这一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汉语中的人情，但它并不直接暗示物质的、金钱的义务。在欧洲语言的背景下，"债务"被理解为支付的责任，相对而言是新近的，因为它可以追溯到十四世纪[[1]](#footnote-1)。然而，这个词本身还有更长的历史和更普遍的含义。正如其拉丁语词源所示（debitum：所欠之物），债务更普遍地意味着欠某人的东西，如父母、朋友、老师、导师，甚至其它并非一定是指某一人的实体。例如，人们会谈论对古希腊文明的人文和民主价值的亏欠，或对唐朝的天才而精细的艺术和技术的亏欠；在亚伯拉罕宗教背景下，人们会援引她/他对上帝的亏欠，从而以历史视野出发，为出自神圣文本形式的道德价值准则铺平道路，无论是妥拉(Torah）、圣经还是古兰经。一个人也可能因为社会为她/他提供了重要的需求、实用的舒适、教育、公民保护或保证对思想和表达自由负责之法律，而对社会有所亏欠；或者，在人类世（Antropocene）这一时代，全球范围内的污染程度令人难以忍受，人们可以谈论对自然的亏欠，因为他们有责任认识到，托人类所处的自然环境之福，人类获得了非凡的生存及进化的机会。

毋需多言，这些形式的感激并不像物质债务（如金融债务）那样，伴有贬义的社会内涵。然而，对某人或某物的亏欠，总是意味着各种形式的互惠。一种是明确的、具体的和可操作的，比如理所当然的，金融债务必须从最初的贷款中得到回报，或者一个罪犯被法庭强令以任何形式的罪行宣判来偿还她/他对社会的债务。另一种则是道德上的。事实上，对于感激的债务，人们并不具体地向个人或任何实体本身偿还。互惠的方式是不明确的、间接的和感觉上的。这种反应转化为钦佩、尊重，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是祝福（beatitude）。

对于如今的现代西方社会，显然不存在任何约束性的道德义务去偿还古希腊的遗产，就像现代中国对唐朝、信徒对上帝、孩子对父母、个人对社会、人类对自然一样。更确切地说，债务相当于对一个人欠下自己以外的实体多少的，一种默契的道德承认。例如，T.S.艾略特很好地概括了这一概念，他在谈到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1922年）时写道："这是一本我们都欠着的书，我们都无法逃离[[2]](#footnote-2)。对许多人来说，西方世界的当代文学，无论是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的变体，都要归功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因为它通过涂抹过去，走向了自我反思，或者通过重温同样的过去，宣告了新的文学表达形式，但正如翁贝托·埃科在他的《玫瑰之名的后记》（Postille al nome della rosa）（1983）中所指出的著名语句那样："并不清白"[[3]](#footnote-3)。同样，T.S.艾略特提到的债务，只能是一种默示；它是一种描绘的模式，转化为对后来的作家欠乔伊斯的认同过程，这种感激，绝不等同于物质上的还债。更多的马克思主义方法会强调艺术家的债务，例如，他/她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时代精神，或历史时期。当乔治·普列汉诺夫在《艺术与社会生活》（Iskusstvo i obshchestvennaya zhizn，1912）中[[4]](#footnote-4)认为，伟大的艺术家表达了他们的时代，但不能改变历史的进程；艺术作品源自于其社会经济的次级结构；或者说，形式由内容决定，因为艺术是社会生活的镜子，他所阐述的不过是强调艺术的社会经济本质的决定性作用，艺术家所欠下的是这种作用。实际上，这里的感激之情，并不像表面上那样默默无言：唯一真实的艺术形式，据称是向我们展示关于生活的社会-经济条件的真相的那一类[[5]](#footnote-5)。艺术家的物质债务也正在于此：社会现实主义成为艺术家偿还她/他对社会所欠的唯一手段，使其它形式的艺术表达或运动，比如现代主义或自然主义变得冗余，进而被认为是堕落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种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债务，是物质的而非道德的。但是，在光谱的另一边，还存在着一种艺术概念，其创造力是丑行、暴力甚至崩坏的东西。例外艺术家，菲利普·索勒在他的《例外理论》（1986）中写道的那些人[[6]](#footnote-6)，不会表现出自己欠下了任何事物，即使是在创造行为中的感激之情。恰恰相反，他们的作品可以包含任何元素，除了有关尊重的，传统的，或预期以内的。在这里，天才艺术家打破了所有权和预期互惠的规则。伟大的艺术家并不因社会以其自身的形象提供艺术的真相而欠下什么。相反，用康德的修辞来说，他们是文化自形成之初以来的，模范模式的唯一延续者[[7]](#footnote-7)。从这个意义上说，至少是社会本身，欠下了对例外艺术家的感激之债。

在任何情况下，债务作为对他者的一种道德回应形式，都不可阻挡地提出了个人及社会层面上的自由问题。如若根据定义，物质债务是一种有约束力的义务，因此与解释自由问题无关，那么感激的债务则不是如此。后者是由受益人决定是否去承还它。在这个意义上，感激之债相当于一种对"他者"的非约束性责任感--而非像伊曼纽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那样，将无限性理解为他者的"脸"的质量[[8]](#footnote-8)。而是作为可辨别的、确实可识别的东西。这种感激之情的概念与加布里埃尔·马塞尔（Gabriel Marcel）所定义的 "可用性"（disponibilité）有许多共同之处，他认为这是人际关系中创造性构成的一个必要条件[[9]](#footnote-9)。可用性和服从性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决定参与这种关系的自由。同样，如果不想变成单方面的控制和胁迫，在最坏的情况下甚至会引发腐败和出于自身利益的讹诈，那么感激之情就必须保持这种自由的度量。

最后，由于一个人从另一个人那里获得好处，而被描绘成非约束性的、对道德回应的默契感的感激之情，可以与犹太教-基督教中理想化的 "礼物 "概念中所暗示的形成对比，正如雅克·德里达所限定的那样，它 "在其纯粹性中，它必须不受限制，甚至没有约束，义务或誓约"[[10]](#footnote-10)。因此，礼物的难题（aporia ）正在于此，因为具体的生活经验，使我们不可能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消除所有期待回报的痕迹——仅仅举例而言，当一个人期待着被接受礼物的人感激他时。尽管如此，感激的债务在其之中包含了德里达所确定的，与礼物相同的缺陷，因为前者是通过交换的方式对某人或某物做出的道德回应，必须维持无约束力。为了解决它的缺陷，感激之情可被理解为以互惠礼物的形式，进行自由选择的回应。这种回应之所以有内在的伦理性寄居其中，恰恰在于其决定中的自由要素。

1. Barnhart, Robert K., ed., Barnhart Dictionary of Etymology（词源词典）, H.W. Wilson Co., 1988; Klein, Dr. Ernest, A Comprehensive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英语综合名词词典）, Amsterdam: Elsevier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1971; Liberman, Anatoly, Analytic Dictionary of English Etymology（英语词源分析词典）,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8; Weekley, Ernest,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Modern English（现代英语词源词典）, John Murray, 1921; reprint 1967, Dover Publications. [↑](#footnote-ref-1)
2. Vassiliki Kolocotroni, Jane Goldman, and Olga Taxidoe, eds., Modernism: An Anthology of Sources and Documents（现代主义：资料和文件选集） (Edinburgh: Edinburgh UP, 1998), 371. [↑](#footnote-ref-2)
3. The postmodern reply to the modern consists of recognising that the past, since it cannot really be destroyed, because its destruction leads to silence, must be revisited: but with irony, not innocently’.（后现代对现代的回答,包括承认过去，因为它不能真正被摧毁，因为它的摧毁会导致沉默，所以必须被重新审视：但要带着讥讽，而非视作清白无辜的） Umberto Eco, Umberto. (1984). Postscript to The Name of the Rose, trans W. Weav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4), 67-68. [↑](#footnote-ref-3)
4. George V. Plekhanov, Unaddressed Letters. Art and Social Life, trans. A. Fineberg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57). [↑](#footnote-ref-4)
5. ‘An artist can be really inspired only by what is capable of facilitating intercourse among [human beings]. The possible limits of such intercourse are not determined by the artist, but by the level of culture attained by the social entity to which [she or he] belongs.’(一个艺术家唯有在能够促进[人类]之间的交流的情况下,才能得到真正的启发。这种交流的可能限度并非由艺术家决定，而是由[她/他]所属的社会实体所达到的文化水平决定) Ibid, Part III. [↑](#footnote-ref-5)
6. Philippe Sollers, Théorie des exceptions (Paris : Collection Folio, 1986). [↑](#footnote-ref-6)
7. See 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Judgement（判断力批判） [Kritik der Urteilskraft, 1790], §46-50. [↑](#footnote-ref-7)
8. See Emmanuel Levinas, Totalité et Infini : Essai sur l’extériorité(总体与无限：关于外部性的论文) (La Haye : Martinus Nijhoff, 1961). [↑](#footnote-ref-8)
9. See Gabriel Marcel, Homo viator. Prolégomènes à une métaphysique de l’espérance（旅途之人：希望形上学导论）(Paris : Aubier, 1945). [↑](#footnote-ref-9)
10. Jacques Derrida, Donner le Temps (Paris : Éditions Galilée) [Given Time: 1. Counterfeit Money（给定的时间：1.假币）, trans. Peggy Kamuf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2), 137]. [↑](#footnote-ref-10)